



第五辑

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

总顾问 李学勤

古史辨伪学者的方法

——《古史辨》读书笔记

梁韦弦 著

亦禮所認觀氏也
故會以酬上下之貽
勸財用之範廟以
史班龜山義帥長弱山序
獨伐以罰莫不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第五辑

全景芳师传学者文库

总顾问 李学勤

古史辨伪学者的古史观与史学方法

——《古史辨》读书笔记

梁韦弦 著

k220.7
10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史辨伪学者的古史观与史学方法:《古史辨》读书笔记 / 梁韦弦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10

(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

ISBN 978 - 7 - 207 - 10160 - 0

I. ①古… II. ①梁… III. ①史评—中国—古代
IV. ①K220.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4741 号

责任编辑: 孙国志

装帧设计: 李 梅 刘建一

古史辨伪学者的古史观与史学方法

Gushi Bianwei Xuezhe De Gushiguan Yu Shixue Fangfa

梁韦弦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E-mail hljrmcbs@ yeah. net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 25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10160 - 0

定 价 38. 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总

序

总 序

《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即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把一位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众多弟子的著作汇集起来,成为丛书印行,乃是近年罕见的创举。

金景芳先生字晓邨,辽宁义县人,生于公元1902年,卒于公元2001年。他终生献身于教学研究工作,早年曾执教小学、中学,1941年进入东北大学,1954年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即后来的吉林大学,前后讲授达60年,授业学生难以数计。金先生自1961年招研究生,“文革”后1981年被评为首批博士生导师,其后共培养硕士16位、博士24位,都已作为高校或科研机构的骨干力量。

金先生享寿期颐,著述等身,其学术渊博宽广,及于文史诸多方面,而其重心在于先秦历史文化。1999年出版的《学林春秋》初编有他的《我和先秦史》一文,篇中将他自己的主要学术成果归纳为五个方面,均列于先秦史范围。事实上,吉林大学长期以来就是先秦史学科的重点,金先生指导的弟子们也都在各自单位对先秦史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所收录金先生弟子的著述,皆系先秦史方面的专题探讨,可以明显看出其与师学的传承关系。

2003年,金景芳先生弟子陈恩林、舒大刚、康学伟三位教授曾编纂《金景芳学案》,经线装书局出版。该书开首收入金先生《自传》与若干代表性论文,以及金先生受其知遇的金毓黻等人传略,然后列举助手、弟子32人,各录其论作二至三篇。《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学案》的继续和扩大,但由于所收都是专著,其性质、规模自然又有不同。

重视学术上的师承关系,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优良传统,而在历史上,最能够系统地体现学术师承关系的著作体裁便是学案。谈到学案,大家自然首先想到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及《宋元学案》。有的学者认为,学案体的出现系受佛教禅宗灯录的影响,这恐怕不真实,或者至少是不确切的。司马迁作《史记》,已经在《孔子世家》之外,专设《仲尼弟子列传》,根据孔壁古文“弟子籍”,记述孔门的传承事迹。《史》《汉》的《儒林列传》,也突出了学



1



者的师传关系。作为学案体发轫的朱子《伊洛渊源录》，特点不过是专题单行而已。其后类似作品很多，到黄宗羲的两部《学案》，将这一体裁的优长发挥到极致，于是成为传统学术史著作的典范。

《金景芳学案》和《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进一步阐扬并且改造了学案体的传统。尤其是《文库》，所收录的都是金门弟子各自的代表性著作，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怎样在继承师学的同时，做出了自己创造性的发展，为今后研究现代的学术史提供了实例和佳话。

我是后学，比金景芳先生小 30 岁，但有机会获见金先生已是 40 多年前的事了。1961 年的一个下午，金先生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来看曾与他同在复性书院的张德钧先生。那天张先生不在，只有我一个留在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就接待金先生，多有承教，最后步行把他送到北京火车站。

从 70 年代末起，我常前往吉林大学，后来还受聘为兼职教授，每到长春，一定去谒见金景芳先生。蒙金先生不弃，我多次主持他的弟子学位答辩，得以仔细阅读他们的论文，对于金先生指点培育所费苦心和辛劳，有十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 90 年代，在答辩会上我总是强调金先生以耄耋之年，仍对学生如此尽力教诲，实为学术史上所稀有。《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所收各书，不少就是他弟子们的学位论文，读者不难通过这些作品，看到金先生教学达到的成效。

金先生在《自传》里讲过这样一段话：“我读书有一个怪脾气，就是不怕难，越难我越想读。又由于我得力在自学，喜欢独立思考。我认为对的东西，敢于坚持，敢于同错误的东西做斗争。”金先生的著作，贯穿着这种深入钻研、实事求是的精神，他的各位弟子也能继承老师的这种精神，在学科发展中取得多方面的建树成果。《文库》的陆续出版，将会向读者充分展示这一点。

最后我还想向作为金先生弟子的各位学者提一个建议，便是尽快编辑金先生的全集。金先生的论著，有的早已风行，但印数有限，今天大家想读，苦于搜求不易；还有一些文章，尤其是早年所撰，久归散佚，更需要下功夫辑集。全集的完成，将同这部《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一起，成为对这位世纪学人的最佳纪念。

李学勤

2005 年 2 月 11 日

农历正月初三





目 录

第一章 古史辨学派的古史观与史学方法的时代性	(1)
第一节 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诉求与古史辨学派的治史宗旨	(1)
一、顾颉刚破坏传统文化的“四种偶像”说	(1)
二、关于中国民族是否衰老的问题的思考	(2)
第二节 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对古史辨学派之古史观与疑古辨伪方 法的影响	(5)
一、康有为对古史辨学者的影响	(5)
二、胡适与顾颉刚的古史观和史学方法	(15)
第三节 清代的考据学与古史辨学派	(21)
一、顾颉刚与《古今伪书考》	(21)
二、顾颉刚与崔述	(24)
三、清代学风及唐宋以来之疑古成果的影响	(25)
第四节 关于古史辨伪学术思想之时代性的反思	(26)
一、关于疑古学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27)
二、关于疑古学者的考证方法	(28)
三、时代要求与史学研究	(29)
结语	(30)
第二章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31)
第一节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	(31)
一、后人有关《新学伪经考》的认识	(31)
二、《新学伪经考》有关古史文献的观点	(32)
第二节 《孔子改制考》	(34)



一、《孔子改制考》的内容	(34)
二、后人关于《孔子改制考》的认识	(36)
第三节 关于《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之学术价值和影响 ...	(38)
一、康有为之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意义与影响	(38)
二、康有为之考证方法上的一些问题	(39)
结语	(44)
第三章 胡适的“历史演进”说	(45)
第一节 胡适的《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45)
第二节 胡适对刘掞藜的批评	(52)
一、关于古史讨论对“人心”的影响问题	(52)
二、对刘掞藜考察古史之态度与方法的批评	(53)
第三节 胡适的“历史演进”说	(56)
一、胡适的“历史演进”说与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古史”说	(56)
二、关于胡适“历史演进”说的认识	(57)
第四节 胡适对古史讨论影响的估价	(59)
一、胡适与顾颉刚对一些问题认识的异同	(59)
二、胡适对古史讨论影响的估价	(62)
结语	(64)
第四章 顾颉刚先生的《诗》《书》研究及其古史观	(65)
第一节 顾颉刚先生关于《诗》与禹的研究	(65)
一、顾颉刚论《诗》与禹	(65)
二、钱玄同对顾先生关于《诗》与禹说的意见	(68)
三、当时学者对顾先生的批评	(70)
第二节 顾颉刚关于《尚书》与尧舜禹的研究	(77)
一、顾颉刚论《书》与尧舜禹	(77)
二、钱玄同关于禹及尧舜及六经史料价值的认识	(79)
第三节 有关古史讨论的持续	(85)
一、顾颉刚、钱玄同对刘、胡质疑的答复	(85)
二、刘掞藜的《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	(87)
第四节 对顾颉刚尧舜禹研究的认识	(91)
一、关于顾先生之《诗》与禹研究的认识	(91)



目

录

二、关于顾先生之《书》与尧舜禹研究的认识	(93)
结语	(97)
第五章 顾颉刚和钱玄同的《周易》经传研究	(98)
第一节 顾颉刚研究《周易》卦爻辞故事的目的和方法	(99)
一、关于以往《周易》经传作者说法的评述	(99)
二、顾先生确定《周易》卦爻辞制作时代的方法	(102)
第二节 顾颉刚关于《周易》卦爻辞中故事的考证	(103)
一、关于王亥丧牛羊于有易的故事	(103)
二、关于高宗伐鬼方的故事	(107)
三、关于帝乙归妹的故事	(108)
四、关于箕子明夷的故事	(110)
五、关于康侯用锡马蕃庶的故事	(112)
第三节 关于《周易》卦爻辞中所无的故事	(114)
一、关于没有尧舜禅让的故事	(115)
二、关于没有汤武革命的故事	(116)
第四节 顾颉刚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	(118)
一、关于孔子与《周易》经传的关系问题	(119)
二、关于观象制器说中的卦象问题	(123)
三、关于《说卦传》与孟京《卦气图》相合的问题	(127)
四、关于《系辞传》观象制器故事的史学认识	(138)
第五节 钱玄同关于今文《易》篇数的研究	(142)
一、关于今古《易》坤卦卦名的写法问题	(143)
二、关于今文《易》的篇数问题	(145)
结语	(147)
第六章 《古史辨》关于禅让说的讨论	(148)
第一节 尧舜禹问题之提出及讨论状况	(148)
一、关于尧舜禹讨论的发生和国内学者的观点	(148)
二、日本人关于尧舜问题的讨论	(149)
三、杨宽的颛顼与尧为一帝分化说	(150)
四、对尧舜禹问题之提出及相关说法的认识	(150)
第二节 顾颉刚论禅让说起于墨家	(152)

一、关于禅让说起于战国	(152)
二、顾颉刚论禅让说起于墨家的理由	(154)
三、关于孔子的政治主张与《论语·尧曰》章之真伪	(156)
四、关于禹受命说及舜禹禅让故事的发生	(159)
五、关于禅让在古史上是否发生过	(161)
六、对于顾先生《禅让说起于墨家考》的认识	(162)
第三节 钱穆的《唐虞禅让说释疑》	(168)
一、唐虞禅让虽为传说古史,但亦不全出捏造	(168)
二、孔孟之言禅让非为托古而伪造	(169)
三、《尚书·尧典》传说不全出后人捏造	(171)
第四节 所谓尧舜禹禅让为争夺说	(172)
一、关于争夺说的来龙去脉	(172)
二、疑古学者对争夺说的否定	(174)
第五节 吕思勉的《禅让说平议》	(175)
一、《禅让说平议》	(175)
二、关于《禅让说平议》的认识	(177)
结语	(178)
第七章 王国维的古史研究方法	(181)
第一节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	(181)
一、“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181)
二、关于传世古史文献的认识	(182)
第二节 王国维与疑古学者对古史文献认识之不同	(184)
一、关于《今文尚书》认识的异同	(184)
二、关于《周易》经传等古文献认识的异同	(186)
第三节 王国维与顾颉刚关于禹的考证	(188)
一、顾颉刚论禹	(188)
二、王国维论禹及顾先生的回应	(190)
第四节 由燹公鑑铭看王国维和顾颉刚的研究方法	(192)
一、燹公鑑的研究	(193)
二、由燹公鑑铭反思疑古学者的研究方法	(194)
三、王国维研究方法的启示	(198)



目

结语	(199)
第八章 杨宽的神话演变分化为古史说	(200)
第一节 童书业对杨宽神话演变分化说的评价	(200)
一、关于神话演变分化说的介绍	(200)
二、神化演变分化说与顾颉刚“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观之关系	(202)
第二节 杨宽对当时几种古史研究方法的评论	(203)
一、杨宽关于古史研究之四派研究方法的评介	(204)
二、对考古、释古方法的批评	(206)
第三节 杨宽自述其神话分化演变说	(208)
一、神话演变分化说的形成	(208)
二、神话演变分化说的主要内容	(209)
第四节 杨宽的《古史传说探源论》	(210)
一、古史传说之造成的辗转讹传与“积誉”“积毁”	(211)
二、对于古史成因三家说的评述	(212)
第五节 关于夏代的传说与夏代之有无	(228)
一、杨宽对夏代存在论的批评	(228)
二、对杨宽否认夏代存在论的认识	(231)
第六节 关于古史传说的演变规律与古史传说系统的形成	(232)
一、关于古史传说的演变规律	(232)
二、关于“东西民族神话之融合与古史传说系统之组成”	(234)
结语	(236)
第九章 《古史辨》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讨论	(238)
第一节 罗根泽关于晚清以前学者对老子其人其书研究之回顾	(238)
一、宋以前和宋人有关《老子》的研究	(238)
二、清代学者对老子其人其书的研究	(239)
第二节 近人诸家对老子其人其书的研究	(240)
一、梁启超对胡适“仍依旧说”的批评	(240)
二、冯友兰、顾颉刚的老子晚出说	(242)
三、胡适对《老子》晚出说的反驳	(244)
四、马叙伦、钱穆、高亨、唐兰等论老子其人其书	(245)



五、叶青、郭沫若、谭戒甫、罗根泽等论老子其人其书	(249)
六、《史记·老子传》，荒诞不可信。	(250)
七、有关老子其人其书之观点的归纳	(252)
第三节 对《古史辨》关于老子人和书讨论的认识	(253)
一、对《古史辨》各家有关《老子》说法的认识	(253)
二、当代学者对于《古史辨》关于老子其人其书讨论的反思	(256)
结语	(257)
第十章 当今学者关于古史和古史文献的认识	(258)
第一节 关于五帝和夏史传说的认识	(258)
一、关于“五帝”的认识	(258)
二、关于尧舜禹禅让的认识	(264)
第二节 关于夏代的认识	(269)
一、关于大禹治水	(269)
二、关于夏代历史的认识	(274)
第三节 考古学与五帝传说和夏史	(279)
一、考古学与五帝及尧舜禹禅让传说	(279)
二、考古学与夏史传说	(283)
第四节 地下材料与传世古文献	(289)
一、甲骨金文材料与传世古文献	(289)
二、简牍帛书与传世古文献	(291)
结语	(294)
主要参考文献	(296)
后记	(300)



第一章 古史辨学派的古史观 与史学方法的时代性

古史辨学派及其古史观与史学方法的形成是时代的产物，或者说是近代时势与晚清以来学术史发展的产物。它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诉求造成的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同时受到晚清以来学术发展的影响。而所谓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和晚清以来的学术发展，实际上又都包含了西学东渐的影响内容。

第一节 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诉求 与古史辨学派的治史宗旨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中国人不断思考原因，寻找出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变革和学术思潮的发生和演变，实际都是围绕中国近代时势提出的问题而展开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也不例外。

一、顾颉刚破坏传统文化的“四种偶像”说

顾颉刚先生于《古史辨》中曾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四种偶像”说。他说：“我们的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其中‘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王制为政治的偶像’，‘道统是伦理的偶像’，‘经学是学术的偶像’。”“这四种偶像都建立在不自然的一元论上，使古代帝王莫不传此道统。有了这样坚实的一元论，于是我们的历史一切被搅乱，我们的思想一切要受其统治。无论哪个有本领的人，总被一朵黑云遮住了头顶，想不出什么方法可以逃出这个自古相传的道，即打不破它，唯有顺从了它。古代不必说了，就是革命潮流高涨的今日，试看革命的中心人物，还是上绍尧舜孔子的道统而建立哲学基



础,就知道这势力是怎样的顽强呢。然而,我们民族所以堕在沉沉的暮气之中,丧失了创造和自信力,不能抵抗强权,我敢说,这种思想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大家以为蓄大德、成大功是圣人,而自己感到渺小,以为不足预于此,就甘心把能力暴弃了,大家以为黄金时代在古人之世,就觉得前途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了。下半世的太衰颓,正由于上半世的太繁盛。要是这繁盛是真的,其消极还值得,无奈只是想象呀!所以我们无论为求真的学术计,或为求生存的民族计,既已发现了这些主题,就当拆去其伪造的体系和装点形态回复其多元的真面目,使人能晓然于古代真相不过如此,民族的光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我们要使古人只成为古人而不成为现在的领导者,要古书只成为古书而不成为现在的皇皇法典。这固是一个大破坏,但非有此破坏,我们的民族不能得到一条生路。”^①

就顾先生的上述说法来看,可以确定地说,顾先生之所以提出要拆去古史里的四种偶像,破坏自古相传的道,实际是他在近代时势之下为寻求解决中国社会之出路问题所作思考的结果。当然,在顾先生看来,为学术之求真和民族求生存的动机是统一的。不过,站在历史发现的高度来看,这种反传统的学术求真主张在中国近代面临民族生存危机的时刻被提出来,肯定不是偶然的,实际主要是受到人们改革中国现状的政治诉求支配的。这一点只要联系中国近代改良、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打倒旧文化之社会思潮的发生来看,是不难确认的。也就是说,以顾先生为代表的疑古辨伪的反传统治史思想,实际是近代以来要改变社会现状的反传统社会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关于中国民族是否衰老的问题的思考

在谈到中国通史的编撰问题时,顾先生说:

这几年,社会上知道我有志研究历史的很多,对于这方面的期求也特别重,许多人属望我编成一部《中国通史》。我虽没有研究普通史的志愿,只因没有普通史,无论什么历史问题的研究都不易得到一种凭借,为自己的研究的便利计,也愿意从我的手中整理出一个大概来。我的心中一向有一个历史问题,渴想借此得一解决,即把这个问题作为编纂通史的骨干。这个问题是:中国民族是否确为衰老,抑尚在少壮?这是很难

^① 罗根泽主编:《古史辨》第四册《顾序》,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解决的。中国民族的衰老，似乎早已成为公认的事实。战国时，我国的文化固然为许多民族的新结合而非常壮健，但到了汉以后便因君主专制和儒教的垄断，把它弄得死气沉沉了。国民的身体大都是很柔弱的；智识的浅陋，感情的淡薄，志气的卑怯，那一处不足以证明民族的衰老。假使没有五胡、契丹、女真、蒙古的侵入，使得汉族人得到一点新血液，恐怕汉族也不能苟延到今日了。现在世界各强国剧烈地压迫我们，他们的文化比我们高，他们不会像以前的邻族一般给我们同化；经济侵略又日益加甚，逼得我们人民的生计困苦到了极端；又因他们的经济侵略诱起我们许多无谓的内争，人民死于锋镝之下的不计其数；眼看一二百年之中我们便将因穷困和残杀而灭种了！在这一方面着眼，我们民族真是衰老已甚，灭亡之期迫在目前，我们只有悲观，只有坐而待亡。但若换了一种乐观的眼光看去，原还有许多生路可寻。满蒙回藏诸族现在还在度渔猎畜牧的生活，可以看作上古时代的人民。就是号称文明最早的汉族所居的十八省中，苗瑶僮僰等未开化的种族依然很多，明清两代“改土归流”至今未尽。这许多的种族还说不到壮盛，更哪里说得上衰老。就是汉族，它的文化虽是衰老，但托了专制时代“礼不下庶人”的福。教育没有普及，这衰老的文化并没有和民众发生多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若单就汉族中的智识阶级看，他们的思想与生活确免不了衰老的批评。但合了全中国民族而观，还只可说幼稚。现在国势如此贫弱，实在仅是病的状态。只要教育家的手腕高超，正可利用病的状态来唤起国民的健康要求。生计固然困苦，但未经开发的富源正多，要增加生意，享用数千年来遗弃的地利，并不是件难事。内争固然继续不已，但或反足以激动人民参与政治的自觉心，使它们因切身的利害而起作内部的团结。（例如四川的民团因军阀的残暴而发生，现已力足以抵制军阀。河南、山东的红枪会也是由于自卫的要求而起，可惜智识太低，以至流于义和团一类的行经，这是须教育家补救的。）体质固然衰弱，但教育方法和生育观念的改变也足以渐渐造成强壮青年，或者过了几代之后可以一改旧观。因此，在这一方面着眼，只要各民族能彀得到相当的教育，能彀发生自觉努力，中国的前途终究是有希望的。这真是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最重大的历史问题。这个问题究竟如何，非费多年的功夫去研究决不能清楚知道。我生于离乱之际，感触所及，自然和他人一样地有志救国；但是我既没有政治的兴趣，又没有社会活动的才能，我不能和他人合作，我很

想就用了这个问题的研究做我的唯一的救国事业，尽我国民一分子的责任。我在研究别种问题时，都不愿与实用发生关系；惟有这一个问题，却希望供给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改造家的参考，而获得一点效果。^①

4

关于中国民族是否衰老的问题的关注，当然并不仅仅是顾先生个人的思考，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当时积贫积弱、外遭列强欺凌侵夺、内乱频仍、民族生存危机的情况下，一部分人思考问题发生之原因以寻找解决途径时提出来的。顾先生的这种认识，首先可以说明顾先生当时要编中国通史，想把这个问题做通史的“骨干”，他是将这个问题的研究作为其唯一的救国事业来做的，是受到其国民一分子的社会责任感驱使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先不考虑顾先生这种认识有多大合理成分，我们首先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思考是由当时的社会问题引发的。结合顾先生关于传统文化之四种偶像的批判来看，可以说明顾先生和当时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中国要解决社会的进步的问题，首先要打倒旧文化。从顾先生关于民族是否衰老问题的分析来看，所谓衰老，主要说的也是文化衰老的问题，实际主要是指传统文化说的。也就是说当时要求打倒旧文化是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实际也确实是社会进步的一种需要，尽管在这种主张之下，实际又有不少片面的看法发生，但这在当时来说是细节和小节，这种思想潮流在当时是进步的，这个评价是不应改变的。

就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来说，我们要确认的问题是，实际顾先生本人虽然对政治并没有兴趣，虽然他不愿意将自己的史学研究与实用发生关系，而事实上他对自己所认为的重要历史问题的关切，却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近代社会时势的影响，都包含着或者说是受到当时社会的政治诉求支配的，而以顾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的学术特征是疑古辨伪，这种疑古辨伪的思想实质，就是在当时打倒旧文化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一种反传统的治史宗旨。所以，它是当时整个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这一点既决定了这种史学的当时的进步意义，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决定了其时代局限性。

^① 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49~50页。



第二节 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对古史辨学派之古史观与疑古辨伪方法的影响

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是受到清代考据学盛行的影响,晚清今文经学变易思想的影响,西学东渐的影响。就中国近代学术思潮与社会思潮的发展来看,大体都是接受西学并试图将西学与中学结合起来的过程。康有为将西洋的进化论与晚清今文经之春秋公羊学的变易思想相结合,在清代考据学盛行的背景下,仍采取考据的方法,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或指古文经乃刘歆伪造,或云《六经》出于孔子之手,其中杂入儒家为托古改制而编造的古史。胡适将西洋的史学方法与清代的考据方法相结合,注意到利用宋代以来考据辨伪的成果,并且明确提出了“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①的观点。这种说法就成为古史辨伪之学学术特征的标治或者说治学方法上的指导思想,后来学者们往往也就称古史辨学派为“疑古派”。作为古史辨学派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先生,其古史观与史学方法的形成,可以说康有为和胡适给予他影响是直接的、决定性的。这里我们主要以康有为、胡适对顾颉刚古史观与史学方法形成的影响,来看中国近代学术发展与古史辨学派之古史观与疑古辨伪方法的关系。

一、康有为对古史辨学者的影响

现在人们都知道康有为所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康有为“于一八九一年刊行了《新学伪经考》。从表面上看,他著那书好像为了发扬今文学,用考据方法来争辨古书的真伪;其实主旨却专在反对‘恪守祖训’的顽固派,驳斥了古文学家‘述而不作’的旧说。”同《新学伪经考》相比,于一八九七年刊行的《孔子改制考》“政治意味比学术的意味浓厚得多。全书二十一卷,首先说明上古茫昧,‘六经以前,无复书记’,一切事迹都无从稽考。进而说到周末时候,诸子百家纷纷起来,创立教义,企图凭自己的理想来建立自己认为最好的社会制度,因为人之常情,‘荣古而虐今,

^① 胡适:《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第一册,第29页。

贱近而贵远”，一味迷信古代而并不明了古代的实际情况，所以各家都把自己所想建立的制度托为古代所曾经实施，藉以争取人们的信仰。如老子假托黄帝，墨子假托夏禹，许行假托神农，都是如此。孔子也是其中的一人，他创了儒教，提出了一套自己创造的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并且亲自著作了《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托古改制的典章，自居为制法之王。当时诸子百家相互争夺教权，彼此攻击，各不相下。结果儒、墨、老三家占了优势，从此三家的互相攻击就更为剧烈。终于因为儒教的教义最为完善，制度最为完备，徒众又盛，从战国历秦到汉，最后取得了一统的地位，从此巩固下来，孔子也就成了全国的教主。”^①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为他倡导变法制造理论根据，其所作刘歆遍伪古书、孔子著作《六经》的考证，皆罔顾事实。不过，有两点实际上影响是极大的：一是在近代首开借考证古书寄托政治诉求之先；二是后来疑古学者的许多主要观点实皆源自康的这两部书。康有为以考据辨伪的方式表达政治诉求，本就是近代时势的产物。所谓时势之产物，一是考据之学风盛于清代而至当时未衰，二是时代提出了社会变革的要求。《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正是这种形式和内容结合的产物。至“古史辨运动”之发生，实际上考据学风仍在延续，而中国近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仍未真正解决，所以如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疑古学者，其学术所包含政治诉求的内容虽与康有为已有不同，其考证的结论比康有为虽更加精细，但其学术中包含当时的社会诉求及其疑古辨伪的学风则是一致的。可以肯定地说，古史辨学者的疑古与清代学风有关，更受到康有为的直接影响，实际是康有为学术内容和风格的延续与发展。

1. 钱玄同与《新学伪经考》

钱玄同于为重印《新学伪经考》所作的书序《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说：

康长素(有为)先生的《新学伪经考》是一部极重要极精审的“辨伪”的“专著”……

这书刚出版就有翻刻和石印的本子，似乎是曾经风行过两三年的。但我敢说，那时读这书的人虽多，然懂它的真价值的一定是极少极少。最下的，大概是因为自翁(同綸)、潘(祖荫)当国以来，《公羊》之学成为

^① 以上见《孔子改制考》之《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页。